

# 在中央召开的中共山西核心小组扩大会議

## 第四次扩大会議上張日清的檢查

毛主席教导我們說：“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麼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

我在支左工作中犯了很严重的錯誤，我现在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林付主席、向中央文革、向中央軍委、向北京軍区党委以及在座的同志們检查。

中央开会解决山西問題很适时，对山西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极大的鼓舞与支持，对我是极大的教育和帮助，从政治上思想上清算了我的严重錯誤，同时加強了核心小組的团结，挽救了山西文化大革命，我很感激。

在會議开始我的态度是不端正的，对自己的錯誤吞吞吐吐，虛虚实实，对同志們、对康老、关鋒同志的意见听不进去，患得患失，思想上长期轉不过弯来，不能从灵魂深处检查自己的錯誤，今后一定要按照主席指示办事，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誓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在党中央毛主席、林付主席、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北京軍区以及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山西核心小组正确领导下，和广大羣众一道，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我的錯誤性质是十分严重的，影响极广。沒有掌握两个阶级、两条路綫斗争这个綱，在两条路綫斗争中，站错了队，爭名利，爭地位，一手遮天，大权独揽，唯我独尊，抵制毛主席的革命路綫，攻击和抗拒刘格平同志，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給山西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损失。犯了方向、路綫的錯誤。

一、上抗中央，对中央指示不坚决执行，不能做到坚定不移，很多問題不听中央，不同中央打招呼，一意孤行，錯誤地认为真理在自己手里，符合自己思想的就干，不符合自己思想的就抵制，就反对，就不去做。

对李雪峯的問題，二月份，康老就打过招呼，以后周总理两次打过招呼，但我偏偏听了刘志兰的汇报，另一方面我对李雪峯有意见，就不考虑中央的意见，认为李雪峯在山西人民中欠下了債，搞一下沒什么了不起，也不請示刘格平同志，就同意了刘志兰的意见。这就干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綫，破坏了天津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次会上中央提出对刘貫一要提高警惕，对刘格平要坚决支持，自己未重視，四月份會議已批判了3·26报告，中央已看透了山西两条路綫斗争的实质，对这个报告我事先未听，事后未批判。中央指示，刘貫一是資产阶级世界观，陈守中是…………。刘志兰是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綫，我未提高警惕，未按中央

指示去做，反而从四月份以后加深了对刘格平同志的成见，错误地认为轰刘志兰是丁磊策划搞的。反对群众的革命行动。

对专政委员会，中央已批评过了，它不是从实践中来的，要撤销，我未执行，反而一意孤行，沿着错误的道路坚持下去。同时中央批评我对刘貫一的话听的多，对刘志兰听的多，对刘格平支持不够，我不听。这次会上，中央表扬了刘格平同志，说他马列主义水平很高，我产生了极不服气的思想。对中央会议精神不传达，而且后来发现有人传出去以后，还让专政委员会追查，主要是觉得降低了我的威信，这样就把自己放在对立面，辜负了中央、主席的期望。对中央派往山西的记者采取不信任态度，认为他有倾向性，对他怀疑，这也是对党中央不信任的表现，曾两次从会议上把他赶出去。这不是对记者个人的问题，这是很恶劣的。还有关锋同志亲自转给我一份刘志兰的材料，我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这是对中央文革的态度问题。

这充分说明，我对党中央的指示，不是无条件执行，而是抵制对抗，对中央极不尊重，对中央派下去的人不尊重，是反中央的行为，是组织纪律不容许的。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这些不符合我的思想。

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四月份以来，山西逐步形成两个方向，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我站错了队，没有坚定不移地站到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方面来，敌我不分，认敌为友，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支持了刘貫一、刘志兰、陈守中这几个埋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定时炸弹，充当了以刘貫一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辩护人和代理人。

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由于我个人主义的恶性发作，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是没有来由的。当中央军委、林付主席表扬了我的时候，骄傲起来，满不在乎，只听顺耳之言，不听逆耳之言，对刘格平同志看不起，思想上对他不尊重，重大问题不请示，不报告，工作中很少商量，一手遮天，大权独揽，不想在他之下，要在之上。而刘、刘、陈迎合了我的这种需要，我想利用他们反对刘格平同志，巩固我的地位。他们想利用我反对刘格平同志，达到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我与他们鬼混在一起，狼狈为奸，互相利用，陷入个人主义泥坑，不能自拔。

我死保刘志兰。刘貫一对我散布了许多反刘格平的话，他提出要做陈永贵的工作，我同意，他经常到我家里，我未拒绝，我同他一起接见群众，发表讲话。我和他们站在一起，充当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防空洞。我还背着刘格平同志、陈永贵同志、曹中南同志同意了刘貫一的意见，与陈、刘一起分析太原形势，刘貫一大讲反刘格平的话，我未阻止。当时我对刘格平有意见，对讲刘格平的功绩，符合我的思想的我也听得进去，不符合的，就听不进去。这次来京前我向中央发了电报（康老这里插话）。同时，我还让解悦去做陈永贵的工作，把解悦引上了邪路。刘貫一提出到大寨做陈永贵的工作，我也同意。这些都是反刘格平的活

动。这是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是非组织活动，是给中央施加压力，是一种罪恶的行为。今天来认识，这种做法是支持一家，反对一家……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目的就是要变为对自己有利，自己是正确的。如果不是这次会议，不是主席和中央挽救了我，再发展下去，必然走上从政治上断送了我的道路，必然走上反党反毛主席的道路。正如康老、关锋所讲的，玩火者自焚，必然没有好下场的，我要感谢党中央、毛主席从政治上挽救了我，把我从死水潭中救了上来。

通过这次会议，我看到了，刘貫一把我推到第一线，先打倒刘格平，最后也要把我打倒，最后在山西复辟资本主义。我过去把刘格平同志坚决执行中央、主席指示，看成无能；把刘格平同志对党中央的忠诚看作无能；把刘格平同志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看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拉一派，打一派；把刘格平同志对我的许多正确意见看成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的确，刘格平同志马列主义水平比我高，是我学习的榜样。我过去未站在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正确一边，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站在刘貫一、刘志兰、陈守中为首的资产阶级一边，做了他们的防空洞，把好人当做坏人，把坏人当做好人（康老有插话）我对人民犯下了罪恶，我要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

三、对4·14问题，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在对待群众、群众组织问题上，我是采取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手法，把自己看作救世主，把群众看作阿斗，不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不是为群众服务，而是要群众为自己服务，对不同意见，一点也听不进去，有唯我独尊、唯我独荣的错误思想。认为自己是真理，不讲道理，一意孤行。对革命群众组织采取了极不正确的态度，在一次讲话中说红总站是挂羊头，卖狗肉，豆腐渣，大杂烩。这实际上是对红总站在政治上打击污蔑。对红联站是支持，我在这里把这个讲话收回，并向红总站认错道歉。

4·14本来是揭开山西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指出斗争大方向，充分发动了群众，是一种革命行动，好得很。但我错误地认为是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红总站、兵团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支持你们，我要向革命小将学习。4·14本来好得很，但我却不顾客观事实，从唯心主义出发，把4·14看成是政治大阴谋，说与当前批判刘、邓、卫、王、王不合，扭转了斗争大方向，对革命群众组织提出打倒刘志兰，挖出二三线，我却说这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反对这个革命口号，这就抹杀了山西省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山西卫、王、王，过去是布置了二、三线的，既有二、三线，为什么不可以挖？另一方面就是保护了刘、刘、陈这一伙坏人。同时，我也曾提过这个口号，因为立场站错了，为了迎合一小撮人的需要，自己推翻了自己过去说的话。另外还说4·14是从上而下发起的，一定有人操纵的。当红联站提出挖4·14后台时，不但不反对，而且支持。在军队支左问题上，对待群众组织之间，支持一方，打击一方，凡和自己观点不同的，支持了红总站没有支持红联

站的，都认为是错了，采取了错误做法，有的撤出，有的调正，太工组训五师撤出了，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同时在几次接见红联站时，讲了许多错误的话，分析了许多错误的形势，结果把红联站引向了邪路，这由我负责。同时还在太原、晋中一部分县，在支左工作中，普遍存在支持一方，压制一方这样一个问题。在晋中问题上，没有坚决按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支持陈永贵、支持任、王、张和晋中被卫、王、王打成的十月事件受害者。这些都是被卫、王、王迫害的同志，没有把他们作为推动晋中文化大革命的骨干力量，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而且在晋中没有坚决站在陈永贵、任、王、张一方，在政治上积极支持他们，生活上关心他们，行动上配合他们。由于我的偏听偏信，支持一方，打击一方，对任、王、张歧视打击，对一百多名受害者未及时平反，刁难他们，领导上同他们唱对台戏，组织上形成了两套车马，造成晋中核心小组的瘫痪，对晋中文化大革命造成很大损失，晋中形势日益恶化，现在有的被敌人利用，造成对七百多名受害者的统治长期得不到解放，造成晋中反陈永贵，反任、王、张，反大寨逆流。这一方面是被敌人利用，另一方面和我的错误思想有直接关系，做出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这七百多干部，是受卫、王、王迫害的，没有支持他们，就是帮了卫、王、王的忙，再次打击了这些受害者。陈永贵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大寨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面红旗，反陈永贵，反大寨，就是反毛泽东思想。所以在晋中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永贵阶级觉悟比我高，立场比我稳，我要向陈永贵同志学习。

四、专政委员会，执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我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中央在四月份会议上就严肃地批评了专政委员会这个组织形式和作用是错误的，我对中央指示置若罔闻，未传达，未执行，反而一意孤行，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违法乱纪，不讲政策，目无法纪，正如康老指出的，是继续执行了彭、罗、陆、杨的一套，和苏修神秘主义的错误路线，违背了毛主席人民民主专政原则，执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夺权后，我曾提出要以军队为主，把专政委员会抓起来，现在看，起了很坏的作用。把专政委员会凌驾于核心小组、革命委员会之上，实际上造成了第二政权。现在有一些专政委员会工作的人員，未肃清罗瑞卿修正主义路线和苏修神秘主义的恶劣作风，所以完全颠倒了敌我矛盾。对卫、王、王及其党羽不用刑，对王谦、王大任不用刑，不痛恨，有的还给吃病号饭，也未上手铐脚镣。相反对革命小将采取了刑法，如对王青英同志关了四个月之久，背铐审讯，残恶之极，对郭宏关押了两个多月，逼供审讯，这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缺乏阶级同情心，完全是犯罪行为。对杨成勋同志进行了非法调查，张冠李戴，做了错误结论，还跟踪盯梢，政治迫害，整理黑材料，暗示群众组织抓捕，对（晋中）革命干部宋志民同志秘密侦查。这是犯法的行为，还巧立许多的名字，什么军管拘留，这些都是犯法行为，这些残忍做法完全是一套法西斯特务手段，是国民党的作风，完全违背了人民民主专政原则，这是卫、王、王的阴魂不散，做了卫、王、王不敢做的事。特别是不准小将在狱中看报，学习毛主席

語录，更是令人发指，不能容忍。这里我向党中央、毛主席，向革命小将請罪，向王青英、郭宏、杨成效、宋志民等同志賠情道歉。我坚决拥护中央撤銷专政委員会的指示，我要在核心小组、革命委員會领导下，通过这次会，监督专政委員会对革命小將的錯誤做法彻底平反，将黑材料銷毀，清算专政委員会过去的罪恶，在清算的基础上立即撤銷专政委員会这一机构。（这时康老批評兰敏）在我的錯誤思想影响下，全省专政委員会程度不同地犯了这样的罪过，不管怎样，我要承担全部責任。

五、由于我在两条路線斗争中站錯了队，在实际工作中张牙舞爪，独揽大权，自搞一套，目无中央、羣众，唯独有自己，处处个人突出。把自己管的山西日报，不是做为山西核心小组、革命委員會的喉舌，不是当做党报，而是当做宣扬个人、树立个人威信的工具，违背了毛主席关于办报的指示，資产阶级革命家对報紙的态度，把山西日报引上了錯誤的方向，由此产生的錯誤是严重的，不管怎么样都由我負責责任。特別是通过軍区兩級干部集訓，在部队中灌輸的一种不健康的思想，就是拥护張日清，反对劉格平这样錯誤的思想。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为什么这样做，主要是因为认为紅聯站大方向是对的，紅总站大方向錯了，特別严重的是从上到下散布了一种极不正常的思想，造成了一种輿論，造成了省核心小组的分裂，革命委員会瘫痪，部队思想不稳，羣众思想混乱，反对劉格平的思潮泛滥，这种思想至今还未很好地刹住車，目前山西普遍存在着省軍区、軍分区、县市公社武装部军队掌握实权，军队凌驾于革命委員會之上，脱离了党的领导，违背了毛主席“党指揮枪”的原則，少數武装部站在保守派一边，有的与当地走資派未划清界綫，专政委員会无法无天，鎮压羣众，执行資产阶级专政，有的羣众組織之間尖銳对立，有的人民武装部調动农民进城，武斗严重。这些严重地影响了抓革命，促生产，这些与我的錯誤思想影响有极大关系，我的錯誤是极其严重的，是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林付主席、中央文革，犯了方向路綫錯誤，上抗中央，下压羣众，突出个人，反对劉格平同志，敌我不分，在两条路綫斗争中站錯了队，給山西文化大革命帶來很大損失，而且会造成更大的危险。

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錯誤，原因是什么呢？

1、个人主义的恶性发作，已到登峯造极地步。毛主席教导我們說：“世界观的轉变是一个根本的轉变”我学毛著不在改造世界观上下功夫，个人主义世界观根深蒂固，以为自己过去打仗勇敢，有战功，老子天下第一，文化大革命中又是最先站出来支左的，又受到林付主席和中央文革的表扬，于是就觉得了不起，有了成績就驕傲自滿，沾沾自喜，喜欢人吹捧，听不得反面意见，象我这样的人怎能不犯錯誤。

2、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林付主席指出，沒有无产阶级观点就看不清政治形勢，就不能执行中央政策，就不能判断是非，就不能为人民服务。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很多問題上是站在資产阶级立场上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沒有政治观点就沒有灵魂。有了資产阶

級的政治觀點就有了資產階級的靈魂，在對待核心小組劉、鄧、陳問題上，都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看待的，看不到問題本質，分不清敵我友，認敵為友。

3、思想方法上主觀主義，工作作風上官僚主義，老子天下第一，目空一切，驕傲蛮橫，缺乏無產階級的階級感情，不相信集體，自己說了算。把羣眾當阿斗，把自己當諸葛亮，當老爺，當上司，正如主席講的，“無實事求是之意，有譁眾取寵之心……”。

4、沒有組織紀律觀念，把黨的組織紀律看作是約束下級，約束羣眾的，對自己不起作用。把自己的錯誤思想看作是毛澤東思想，眼里沒有組織、沒有中央、主席，軍委、中央文革、北京軍區黨委，對劉格平同志不尊重，對核心小組不尊重，心目中沒有羣眾，不是自己為人民服務，而是要人民為自己服務。根本問題就是世界觀問題，長期發展下去，會犯更大的錯誤。這是我最沉痛的教訓，對黨對人民犯下了罪。我要向中央、主席、山西省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革命小將請罪。

我的錯誤是嚴重的，教訓是沉重的，我願接受中央、主席給我的處分，願將我的錯誤向革命羣眾進行檢查，並且向廣大羣眾公布我的錯誤。我的錯誤是嚴重的，教訓是沉痛的。今后一定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認真讀毛主席的書，破私立公，徹底改造世界觀，聽中央、主席、林付主席、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話，在北京軍區黨委、在劉格平同志為首的山西省核心小組和山西軍區黨委正確領導下，依靠羣眾，相信羣眾，依靠集體，甘當小學生，從頭做起，甘當第二把手，甘當格平同志的助手，從頭干起。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挂帥，到羣眾中去，接受羣眾的監督，鍛煉改造自己，和山西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革命小將一起堅定不移地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以上是我對自己錯誤的初步認識和檢查，還有很多地方是不深刻的，還沒有認識到。請同志們批評幫助，我好繼續進一步認識自己的錯誤，在實踐中堅決改正，同時繼續檢查自己的錯誤。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打倒劉、鄧、陶！

打倒衛、王、王！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張日清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晚

陽泉市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翻印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